

清代考课制度研究

常越男 著

李七先生著《清代考课制度研究》一书，内容涉及内务府及六部、太仆、武官军机、督学利用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，进行量化分析，探讨考课制度的指导思想、确立原则、选择程序、运作机制，及其得失。阐述了制约某发挥作用的姑田制，揭示了在皇权专制、官僚政治体制下，考课制度与皇帝、国家、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，此外对清代宣统政局更清整顿、满汉吴家等问题也有简要明晰的评述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

清代考课制度研究

常越男
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考课制度研究/常越男著.一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.7
(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301-17459-3

I. ①清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考试制度-研究-中国-清代
IV. ①D691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0170 号

书 名: 清代考课制度研究

著作责任者: 常越男 著

责任编辑: 张晗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7459-3/K · 0703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 辑 部 62752025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24.75 印张 410 千字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 权 所 有,侵 权 必 究

举 报 电 话: 010-62752024; 电子 邮 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编辑委员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王天有 房德邻 茅海建 徐 凯

徐万民 郭卫东 郭润涛

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

代序 制度、制度史与清代政治制度特色

徐 凯

何 谓制度？在古代的语境下，有两层含义。一是法令和礼俗的统称。《易经·节》云：“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”〔疏〕正义曰：“王者以制度为节，使用之有道，役之有时，则不伤财，不害民也。”^①《尚书·周官》记载：“又六年，王乃时巡，考制度于四岳。”^②二为政治上的规模、法度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载，汉宣帝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”^③古代的政治与制度相关，其意亦分两面。一面是言政事得以治理。《尚书·毕命》曰：“道洽政治，泽润生民。”汉孔安国注：“道至普恰，政化治理，其德泽惠施，乃浸润生民。”^④汉代贾谊说：“有教然后政治也，政治然后民劝之，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。”^⑤清时任吴江令的郭琇为供前任某抚军的奢欲，聚敛乡里，“以贪黩闻”。江宁巡抚汤斌招之来，教以贞廉。郭琇自洗其堂庑，曰：“前令郭琇已死，今来者又一郭琇也。”其“政治为之一变”。此处政治乃为治理。^⑥另一面则讲治理国家所施行的各种措施。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记载，遂师“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”^⑦。《汉书·京房传》亦载：中书令石显告郡守京房等通谋，“诽谤政治，归恶天子”^⑧。而将制度与政治相联为“政治

^① 《周易正义》卷六《节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（标点本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以下引《十三经注疏》版本同上。

^② 《尚书正义》卷一八《周官》。

^③ (汉)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九《元帝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下同。

^④ 《尚书正义》卷一九《毕命》。

^⑤ (汉)贾谊：《新书》卷九《大政下》，卢文弨校本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版。

^⑥ (清)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四《汤文正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。

^⑦ 《周礼注疏》卷一五《地官·遂人》。

^⑧ 《汉书》卷七五《京房传》。

制度”一词，则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成立之后的事，它的内涵更加明确，通常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关的制度。

古代政治制度是王朝国体与政体的集中体现，也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，以及政权得以运作的保障。千百年来，尽管政治制度有其相对稳定性，但随着社会发展也在部分调整更新，而陈规陋制亦是官僚政治滋生恶习的温床。春秋时期，宋督弑君夷臣，取郜国大鼎，置于太庙。臧哀伯执意不可，谏曰：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”^①“政事所施，未可谓能合法度。官乱于上，民贫于下。”^②即是此意。自古迄今的政治制度均具有两重性，一是传承性，承上启下；二为变化性，革旧布新。倘若对一个王朝的制度不明，就很难从纷杂的史事中看清它的演进脉络。如同先哲们所云，“读史先读志”。否则研习历史就难得要领。中国传统史学研究“政治大端”。所谓“大端”，即大事。先秦以降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古代王朝之大事，自然包括神祇、军事、政治、法律等层面。实践证明，中国政治制度史历来是历史学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。

卷帙浩繁的“二十六史”等典籍，尽载历代帝王的“大端”。汉代司马迁编修“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，编纂方法上采用“本纪”、“表”、“书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等“五体”。以彰显帝王的“本纪”、彰显将相等的“列传”为主，以记述典章制度的“书”为辅，故称“纪传体”。《史记》开启了制度史研究的先河。正如宋人郑樵在《通志·总叙》所言，《史记》“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”。^③班固撰成“包举一代之史”的《汉书》，承袭《史记》体例，略加变更，将“书”改成“志”，“世家”并入“列传”，整齐划一了纪传体裁。《汉书》“十志”在《史记》“八书”的基础上扩展而来，又新辟《地理志》、《食货志》、《刑法志》等五志，从此修史重视制度的编纂。如同清人章学诚所云：“固《书》因迁之体，而为一成之义例，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。”^④由此可知，政治制度史的关注由两汉发凡起例，尔后历代官私史作，亘古不移。

20世纪初，梁启超高举“新史学”旗帜，倡言“史界革命”，吸纳西方的学术理念与方法，批判旧史学的弊病，“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”。新史学冲破

①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五，桓公二年夏四月戊申。

② (宋)王安石：《上时政书》，《王安石全集》第一卷《书》，秦克等标点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③ (宋)郑樵：《通志·总叙》，《通志·二十略》上，王树民点校本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版。

④ (清)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卷一《内篇一·书教下》，叶瑛校注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版。

了传统长于叙事、短于理论的“叙述史学”的藩篱，在内容和方法上均产生了巨变。新式的史学论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。就 40 年代已出版的大量史著而言，主要可分两类：一为新式中国通史。此类著作不少为新式学堂的历史教科书。1905 年，刊行最早的是柳诒徵编撰的六卷本《历代史略》，之后，梁启超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等问世。而影响广泛的当是 1904—1906 年刊行的夏曾佑著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。三四十年代，李泰棻的《中国史纲》（三卷）、邓之诚的《中华二千年史》（四卷）、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（两册）等相继付梓，这些通史均记述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。二是新式典制史。这类著作包括通史、断代史、专题史等，例如，曾资生的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、杨熙时的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、喻亮的《中国政治制度概论》等；陶希圣等的《秦汉政治制度》、方瑜的《唐代的科举制度》、章中如的《清代考试制度》等；高一涵的《中国御史制度沿革》、李俊的《中国宰相制度》、徐式圭的《中国监察史略》、秦松石的《中国历代兵制概要》等。此阶段典章制度研究的内容较广，成果亦丰。可知典制史在新史学中所处的显著地位。

50 至 70 年代，前十七年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纂的中国通史与断代史，仍以叙述各朝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之一。譬如，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、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（修订本）、吕振羽的《简明中国通史》（修订本）、翦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等。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专著则凤毛麟角，诸如许大龄的《清代捐纳制度》、唐长孺的《九品中正制度试释》、岑仲勉的《府兵制度研究》、商衍鎏的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等，皆为质量上乘的断代专题制度研究的名著。面世的学术论文涉及皇帝、官制、兵制、法律、科举、地方行政等层面，文章较多，兹不举例述要。应当说这一阶段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颇具影响的成果。而后十年，学界受到“文革”的巨大冲击，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岁月里，“极左”倾向作祟，史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，“评法批儒”，“影射史学”，使得历史研究走上极端。十年浩劫使历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始终处于停滞状态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无从谈起。

80 年代以来，即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是历史学发展的最活跃时期。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，开阔了学人的眼界，突破了以往研究的“禁区”，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繁荣局面。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又引入政治学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，从官僚政治、政治文化等新视角，探讨官僚、制度和文化的关系，将中国官僚政治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或体制加

以阐述。可以说,此段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。为适应高校学科建设和教学之需,出版了一批政治制度史的教科书和专著,例如,王汉昌等的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》、左言东的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、罗映辉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》、韦庆远主编的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等,有几十种之多;专项制度史的著作有肖永清主编的《中国法制史简编》、张晋藩的《中国法制史》、陈光中等《中国古代司法制度》、王汉昌主编《中国古代人事制度》、李铁的《中国文官制度》、周继中主编《中国行政监察》等;断代制度史的著作有安作璋等《秦汉官制史稿》、严耀中的《北魏前期政治制度》、祝总斌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、关文发等《明代政治制度研究》等,各式论著丰富。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学术之作。但是一些著作,尤其是教材,侧重于叙述制度,体例小异,内容编排雷同,缺乏理论与学术的创新力度。近十年来,断代制度史专题研究颇有发展,深入地探讨某一课题,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。

多年来,就如何深入研究政治制度史这一课题,不少学者抒发己见。韦庆远先生在《明初的三杨与儒家政治》一文指出,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史,不但应注意官书政书中登载的各种诏谕律令等条文规定,还更应注意其实际表现;不但应注意其“体”(体制),还更应注意其“用”(运用、作用)。仅排比官制的源流变迁、品秩、职掌、衙门等级等,“可能只得其形而失其神,甚至其神也走了样的”。“体”是躯干,“用”是气血精神,离开了气血精神和实践而研究躯干,顶多与解剖尸体相同,不能全面、准确地反映出相关制度的实质。^① 研究必须从制度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,不能离开政治而研习制度,应将典型的人、事与制度作为互动关联的一个整体,作动态制度史研究,方能揭示制度的本质。应当明确地说,韦先生的主张引领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方向。

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?不少学者均作过共性的概括,大体有以下几点:第一,君主专制、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相结合,贯穿古代社会始终。第二,政权与神权相结合,以君权神授为王朝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。第三,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,以名教为准则,体现礼法相联和等级尊卑。第四,制度是王朝维护统治的工具,它自始至终伴着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,陈规陋习也导致吏治的腐败。第五,在君主高度集权制度

^① 参阅韦庆远:《明初的三杨与儒家政治》,《史学集刊》1988年第1期。

下，行政事务均由皇帝钦定，人治胜过法制。君主凌驾于制度之上，不受约束。^① 这些特征是中国古代特殊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产物，也是区别于西方列国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。古代有大小王朝 61 个，分别由汉族、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、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等民族的贵族阶层建立。他们所建政权的政治制度既承袭了中原王朝的制度，即所谓“汉化”；同时也保存其自身民族的特色，诸如，辽代的“南北面官”、“投下军州”，金代的“猛安谋克”、“勃极烈”制，元朝的“怯薛制”、“达鲁花赤”，清朝的“八旗制度”等。这是由该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。

清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王朝，其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执政，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。清代政治制度仍是以皇权为核心，如同高宗所言：“本朝家法，自皇祖、皇考以来，一切用人、听言大权，从无旁落，假即左右亲信大臣。”^② 其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，又有满洲民族特色，使其统治得以维系 267 年。而该制度的突出特点有四：

一、制度与“家法”相联。清朝“家法”森严，其宗旨是严密防范一切侵犯皇权、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。家法成为第一大法。高宗说：“我朝家法，独运乾纲。”针对明末的诸种社会弊端，清代各种制度凸现“家法”精神，清初几位帝王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严防。世祖鉴于往代宦官擅政典兵，流祸无穷，于交泰殿铸铁牌示警，并依明宫寝旧制，裁撤十三衙门，再立内务府，“至是奄宦之权悉归于府矣”^③。外戚不容专权，权臣不得干政，并严行禁止士习不端，结社订盟。圣祖则禁止官员私置党羽，蠹国害政。世宗撰《朋党论》，告诫臣僚。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化，防范制度的完善，有清一代大部分时间没有出现汉唐以来母后专权、权臣擅政、外戚篡权、宦官乱政、臣僚结党等局面。这样的“家法”也极易导致清朝“全只有法术，更不见制度”^④。

二、糅入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。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就借鉴了契丹的“八部大人”、金朝的“猛安谋克”制，以及明代卫所的总旗、小旗等；部分机

① 参阅韦庆远、王德宝主编：《中国政治制度史·绪论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2 年版。

② 参阅王先谦：《十一朝东华录》卷二八，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，宣统辛亥存古三印本。

③ 《清史稿》卷一一八《职官志五·宦官》。

④ 钱穆：《中国历史政治得失》第五讲，三联书店，2006 年版。

构名称又吸纳朝鲜称谓，例如，崇德时期设立内三院，即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、内弘文院，它们的名称及其职掌均参酌了朝鲜王朝承文院、承政院、弘文院等制度。就连六部早期正副长官的名称承政、参政都参用朝鲜部院职官之名。^① 文化上彼此相互借鉴，这也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权建设上的一个共有特征。

三、彰显满洲贵族与官员的地位。在“首崇满洲”的清代社会，官员虽设满蒙汉复职，但制度本身却凸显满洲的地位。国初定制，议政王大臣会议数员，“皆以满臣充之”。顺治元年起，中枢机构六部、理藩院、都察院的长官皆为满缺，五年始增汉缺尚书一员，汉缺左都御史一员。六部满汉侍郎均分左右，理藩院左右侍郎、盛京五部侍郎皆为满缺。而六部等衙门实权皆操持在满官之手。由此满汉官之间渐生矛盾。会议之时，一二人发言，众俱唯唯。汉大臣“则必有涉于彼之事，方有所言；若不涉于彼之事，即默无一语”。“大小汉官，凡事推满官。”^②大学士不问政事，虽各兼部务，“亦见夺于满尚书”，间有建白，无关大政^③。这样的习惯压抑汉官的积极性，从长远看，对清廷政权的稳定并不利。

四、“仿古效今”，承袭明制。后金初创，制度未全，多仿明制。皇太极指出：“凡事都照《大明会典》行，极为得策。”清定都燕京，多尔衮摄政期间也一如明制。也就是说清前期基本上是继承明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，定内外文武官制，“略仿明制而损益之，兼用满汉人”^④。比如，清代从中央的内阁、六部、翰林院、六科给事中、都察院等，到地方的行省、道、府、县衙门的建置，与明朝大同小异。

近十余年来，应当说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。特别是一批史学功底比较扎实，思维敏锐的青年博士生成为该领域的生力军。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面宽，发掘新史料，开拓了不少新课题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深入探索，真知灼见迭出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青年学人的迅速崛起，昭示着清史学术苑囿必将繁花似锦。

^① 参阅〔朝鲜〕《经国大典》卷之一《吏典》，影印本，韩国保景文化社，1995年版。〔朝鲜〕《官案·内案》，韩国图书馆研究会编，宝晋齐株式会社发行，1971年版。

^② 参阅王先谦《十一朝东华录》卷八三，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乙未；张廷玉等纂：《吏部则例》卷一一，乾隆七年武英殿本。

^③ (清)梁清标：《蕉林诗集》四，康熙十七年，秋碧堂刻本。

^④ 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七七《职官一》，万有文库本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版。

越男君正是这支青年生力军的一员,喜治清史,对清代政治制度尤有志趣。她将《清代考课制度研究》作为博士论文选题,刻苦钻研,用功甚勤,五易寒暑,杀青论文,得到评审和答辩同行专家的一致称许,获得博士学位。考课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历代皇帝对文武百官管理和掌控的主要手段之一。考课官员的目的是奖优汰劣,激励官吏更加效忠帝王,察吏安民,维护一方的长治久安。这是官僚政治不可缺失的内容之一。以往学界对清代官员考课制度研究薄弱,缺乏较全面而深入的解析。该文对有清一代朝官“京察”、外官“大计”、武官“军政”作了系统而翔实的论述,在理论和学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,对当今公务员队伍建设也有借鉴作用。它是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,填补了清史研究的一项空白。

制度史研究不应当拘泥于条文标本式的说明,而应凸现人、事件和制度的互动关系,治活的制度史,方可揭示在不同的制度下的皇帝、官僚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作用。《清代考课制度研究》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。作者翻检了卷帙繁多的官修政书典籍、私人文集、笔记等,尤其是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吏部档、内阁黄册、吏科题本等大量档案,史料采撷宏富,在此基础上,提出新论。该文将制度规定、运作机制,以及皇帝、官僚的相互关系,联系在一起考察,使清代官员考课制度动起来,从中披露制度的得失,给人以启发。倘若说该项研究有何尚待改进之处,那就是应加强理论的升华,更深层地揭示规律。在历史研究中,要树立问题意识,加强理性思辨,避免停滞在具体感知上。理论分析之深浅,决定论文质量的高下。汉代孔安国云:“序者,所以叙作者之意也。”^①假借此语,不知拙序是否已达其意?

1997年秋,越男君负笈北大,从本科到博士生,燕园苦读,屈指九载。我忝为导师,目睹了她辛苦求学的全过程,也为她学术的每一进步而感到欣慰。春华秋实,耕耘收获。她的博士论文《清代考课制度研究》又经数年反复推敲,终将付诸梨枣,可喜可贺!越男博士现已走上科研岗位,当戒骄戒躁,不可怠慢,在艰辛的学术征程中,上下求索,持之以恒,定能做出业绩。

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诗曰:“古来青史谁不见,今见功名胜古

^① (唐)刘知幾:《史通》卷四《序例》,中华书局,1961年版。

人。”^①南宋词人张孝祥语云：“立志欲坚不欲锐，成功在久不在速。”^②兹特录此语以赠，彼此相勉。是为序。

庚寅年五一劳动节 写于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寓所澹泊书屋

① (唐)岑参：《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，《岑参集校注》卷二《编年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版。

② (南宋)张孝祥：《张孝祥诗文集》卷一七《论治体札子》，黄山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

目 录

代序 制度、制度史与清代政治制度特色	徐凯 (1)
绪 言	(1)
一 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	(1)
二 以往研究的学术概述	(5)
三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	(13)
四 研究思路与征引文献	(14)
第一章 考课制度的确立	(16)
第一节 古代考课制度的流变	(16)
第二节 清代考课制度的形成	(24)
一 官员历俸三年考课——考满制度	(24)
二 全体官员定期考课——京察、大计、军政	(42)
第三节 制度确立的准则	(69)
一 沿袭明制,加以变通	(69)
二 简易化原则	(71)
三 反对虚文,重视实效	(72)
四 满汉互异与满汉一体化	(73)
第二章 京官京察	(75)
第一节 考察的基本规制	(75)
一 考察机构	(75)
二 考察范围	(80)
三 考课之法	(83)
四 文书格式	(84)

第二节 考察的标准与奖惩	(89)
一 考以“四格”	(90)
二 纠以“八法”	(100)
第三节 自陈程序	(103)
一 康熙年间的自陈	(104)
二 雍正年间的自陈	(107)
第四节 列题的确立与实施	(115)
一 “举贤自代”制度的尝试	(115)
二 自陈制度的废止	(117)
三 列题确立	(119)
第五节 引见制度	(123)
一 三品京堂的引见	(124)
二 四、五品京堂的引见	(125)
三 五品以下京官的引见	(126)
四 一等官员的引见	(126)
五 二、三等官员六十五岁以上者引见	(130)
第六节 会核的程序与结果	(133)
一 应留三个考等人数分布	(134)
二 应留官员考等分布	(138)
三 应留各考等人数变化	(142)
四 等次变更	(152)
五 应去官员	(170)
第三章 外官大计	
第一节 考察的相关规定	(176)
一 考察机构与方式	(176)
二 考察范围	(181)
三 大计造册	(183)
第二节 考察标准与考等	(194)
一 大计“四格”	(194)

二	大计“八法”	(200)
三	考等实施	(201)
四	大计与日常考成	(202)
第三节	卓异官	(205)
一	卓异的标准与卓异典型	(206)
二	列入卓异范围的调整	(219)
三	附荐卓异制度的执行与废止	(223)
四	卓异定额	(228)
五	卓异引见	(231)
第四节	平等官员	(235)
一	分等的依据	(236)
二	各等人数分布	(237)
三	考等的变化	(241)
四	考等的职位分布	(245)
第五节	“八法”官员	(248)
一	“八法”各款项释义	(248)
二	“八法”(“六法”)各条目比例分布	(253)
三	职位分布	(261)
四	处分与引见	(265)
第四章	(273)
武官军政		
第一节	考核的基本规制	(273)
一	考核机构与方式	(273)
二	考核的范围	(277)
三	考核的造册	(281)
第二节	考核的标准与奖惩	(283)
一	军政“四格”	(283)
二	军政“八法”	(284)
第三节	自陈制度的确立与废除	(286)
一	自陈的范围	(287)

目 录

二	自陈的实施	(288)
三	制度的废止	(291)
第四节	军政的考等	(293)
一	军政卓异	(293)
二	平等官员	(302)
三	八法官员	(303)
第五章		(316)
官僚体制下的考课制度			
第一节 考课制度的特点 (316)			
一	原则明确,标准清晰,重视实效	(317)
二	详定考察等第,对一些考等的 人数比例和职位的限定	(318)
三	加大皇权对考课的掌控, 引见成为考课的必定程序	(320)
四	体现“首崇满洲”的政权特色	(321)
第二节	考课制度的作用	(322)
一	激劝群僚,擢拔人才	(323)
二	对供职官员的劝惩	(327)
三	裁汰不适当官员,澄清吏治	(329)
第三节	考课制度运作中的主要问题	(335)
一	定期考课受到冲击	(336)
二	举劾公平性失衡	(347)
第四节	制约考课制度的诸因素	(354)
结语		(370)
参考文献 (373)			
后记		(383)

绪 言

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统治的王朝,满洲贵族在借鉴前朝的统治经验的同时,完善并发展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,官员的考课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。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员定期考核其政绩、功过等,分出优劣等次,予以奖赏或惩罚。清代对文官和武官的考课是分开的,在内文官考课称“京察”,在外文官考课称“大计”,武官考课则通称为“军政”^①。

|一 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|

清初的制度多袭明制,模仿的色彩较为浓重。康熙、雍正时期的制度发

① “军政”一词的含义在清代史料记载中较为多样化。清代政书中将“军政”一词作为武官考课的专称,“五年军政”是武官定期考察的制度。满语中,“军政”一词是choohai(军事) dasan(政事) i(的) simnembi(考试),翻译为汉语是军事政事考察。同时,清代各种史料中亦用“军政”一词代指军国大政、军事政策、军事情势、军饷军需等等。本书根据清代政书等原始文献,使用“军政”这一专有名词。在个人陈述的某些地方,为了避免与“军政”一词的其他含义混淆,有时使用“军政考察”字样,特此说明。满语部分的表达参考:安双成:《满汉大辞典》,辽宁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崔宰宇:《汉清文鉴简编》,民族出版社,2005年。